## 张孝德：中国生态主义思潮新趋势

原文载于《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孝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针对环境与能源危机，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哲学、文化、经济与制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生态主义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随着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生态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思想潮流和环保运动。生态主义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以来，原来主要流行于欧美的生态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骤然升温，而且还表现出欧美所没有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生态文明在中国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核心理念**

生态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始终未能成为进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的主流。在欧美生态主义思潮中，对国家发展影响与作用最大的是德国绿党。德国绿党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并开始绿色运动。在1983年的大选中，德国绿党成为欧美国家第一个在国家级选举中进入国家议会的绿党。在2002年的大选中，绿党以8.6%得票获得55席，成为仅次于德国社民党和基民盟的第三大党。2005年9月，因解散议会而提前举行的新一届联邦选举中，绿党席次减少，变成议会中第五大党。总之，虽然德国绿党成功地进入了国家议会，但始终未能成为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执政大党，所以他们的生态主义主张只是渗透在国家的决策中，未能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方向战略和理念。

而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则不同。虽然生态文明思潮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而且富有创新性。所谓起点高，就是生态文明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态文明就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国策的战略和核心理念，这在欧美国家是没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而且在世界环境保护中，中国也以应有的大国责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积极参与推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中，还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上，中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准备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一事相比，可谓对照鲜明。

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率先高举生态文明旗帜的国家，使在欧美国家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生态主义第一次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和核心理念中，这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生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积极快速发展，得到了世界生态理论专家的高度重视与赞赏。2013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克莱蒙大学城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第7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世界著名生态文明研究专家、后现代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博士就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中国”。

**世界生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一种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新生态文化启蒙运动正在悄然兴起**

从哲学与文化高度，对工业文明时代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线性思维的机械观的反思与批评，是世界生态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针对现代西方哲学过度强调分解高于整体、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总和、价值中立要高于人类价值尺度的哲学观等观点，在西方兴起了从系统有机、天人合一、自然伦理价值等角度认识世界的后现代哲学和过程哲学。但由于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评，面对的是一个经过几百年形成的，且在工业文明时代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哲学思维，所以后现代哲学在西方的发展举步维艰，被社会认可与接受十分艰难。

但是生态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有一番景象。西方哲学家需要跋山涉水、踏破铁鞋寻找的后现代哲学，恰恰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自然而然存在的东西。在西方需要有很高智慧的哲学家才能发现与掌握的哲学，在中国却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在生活、生产中的习惯思维，是一种须臾不离的生活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传承与复兴中国优秀文化战略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表面上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件事，却发生了相互融合的化学反应。

在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系统辩证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集体与个体和合的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天下太平的人类观，恰恰是化解当代人类环境危机、文明危机最需要的解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费力普•克莱顿博士在第七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指出，“医学科学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但是只有古老中国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品质”，“如果中国单纯地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结果势必是毁灭性的。如果追求只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如果有可能，那只能是中国”。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2016年的中国有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契合与汇合中，一种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新生态文化启蒙运动正在悄然兴起。一方面是遍布全国、自下而上的各类国学班、传统文化学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经过大量调查后我们发现，无论什么类型的国学班和传统文化学习班，凡是来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天然的保护主义者。而且更多人还是知行合一的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在国内召开的各种类型的生态文明论坛和培训中，都一定会有传统文化的内容。

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从2001年开始，就把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到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届，2016第七届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每届会议都围绕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展开研讨，在生态文明研究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16第四届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在贵州举行，以“心灵环保•世界和谐”为主题。作为国内著名的贵州国际生态文明论坛，其中的主题论坛“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是每届国际生态文明论坛最大的亮点之一。随着论坛知名度、美誉度、认同度、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高，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生态文明与宗教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如果说五百年前，起始于地中海的文艺复兴成为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方兴起的启蒙运动，那么五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基于东方智慧的新生态哲学和新生态文化，将是开启生态文明的又一次新启蒙运动。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环保意识觉醒，追求绿色生活方式**

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大面积雾霾天气出现，食物、水质不安全问题的加重，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类疾病的增加，使人们开始反思现代生活的弊端。在问题的倒逼下，一些城市中产阶层的环保意识不断觉醒，再加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和推行，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出现了一批关注生态与环保、尝试绿色生活方式的践行者。这种绿色生活方式的新潮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倡导有机消费、健康消费的慢生活。现代化学农业、工业化式大规模养殖、种植农牧业，是造成食物中毒的深层次原因。要得到无毒有机食物的唯一途径，必须从改变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开始。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叫做融有机消费与有机种植为一体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在欧美、日本、台湾等地迅速发展起来。最近几年，这种新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也开始被中国少数中产阶层所接受。有机消费慢生活、自足生产的社区农业成为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一种新消费形式。为适应这种绿色消费新潮流，各种与有机有关的社会组织、论坛会议在2016年纷纷涌现。

2015年末，第六届国际社区支持农业大会/第七届中国社会农业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生态农业实践先锋、学者与国内2000多人参加了会议。2016年8月11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中心、贵州省政府、黔东南州政府等多家机构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黔东南)有机大会暨国际有机峰会在贵州黔东南召开。由国内众多国家级涉农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生态农业大会暨世界新农人大会，于11月3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该大会将于2017年4月23日至4月30日在北京、成都、新疆五家渠分别举行。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之所以在2016年的中国快速升温，是因为众多机构和企业看到了一个潜在的新市场，这就是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的、追求有机消费的新群体的兴起。

二是主张节俭、低能耗的绿色消费。今天的中国处在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对于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而言，有两种消费同时存在。一种是满足欲望与面子的奢侈性消费。这一群体的消费，使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但同时，另外一种回归绿色、崇尚节俭的消费方式也在兴起。他们基于环保的自觉，开始主动改变高能耗、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三是本着“知行合一”的理念，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中。目前，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6816家（2012年统计数据），而且仍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在各类环保组织中，作为中坚力量的，是从中产阶层游离出来一批环保人士。

**乡村生态主义在中国兴起，成为生态主义在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五千年的乡村文明，在今天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在当代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乡村，成为认识时代的分水岭。如果从工业文明的逻辑看，乡村不能够承载工业化经济，最终会被城市所替代、走向终结。但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乡村恰恰不仅拥有城市所没有的依托自然资本发展乡村绿色经济的优势，同时，乡村也是生态主义者所寻找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利他共生生态文化的生发之地。乡村特有的低能耗、低消费、低成本的有机、健康、互助的乡村生活，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所倡导的绿色生活方式。

乡村遇工业文明而衰，逢生态文明而兴，这是当代中国乡村的命运。无论是从生态文明时代看，还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看，中国五千年的乡村文明复兴是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是有根的中国梦，这个根就是携带着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没有乡村文明的复兴。同时，中国梦也不可能是追赶已经走向衰微的西方工业文明梦，必须是另辟蹊径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以复兴乡村文明为使命，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乡建运动就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生态主义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生态主义，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定县翟城村实验”。2003年，被称为“温三农”的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在河北翟城村，开始了乡村建设实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其实就是乡土情怀加生态主义情怀的实验。温铁军教授所带领的乡建团队虽然历经坎坷，但由于他们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事，所以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外乡村建设影响最大的力量之一。

最近几年，随着城市污染病的加剧、城市中产阶层对有机食品和绿色生活的需求、乡村互联网经济发展，在多种综合力量的作用下，出现了一部分城市的知识分子、各类民间组织、新乡贤下乡的新趋势。在乡村生态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城市与乡村双向流动的新城镇化正在出现。特别进入到2016年以来，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小众关注的乡村，一下成为诸多主流媒体、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家关注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西方生态主义思潮的兴起，发生在西方城市化完成之后。而当代中国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潮，是在中国乡村仍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出现的，当代中国出现的乡村生态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现象。目前，中国乡村生态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上，把乡村置入生态文明时代视野下，把乡村置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坐标中，重新解读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在新时代的价值。在2016年8月举办的首届中国有机农业大会上，笔者提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三农”概念：即有机农业、智慧农民、文明乡村“新三农”发展新目标。

其二，乡村传统文化活化与现代生态主义潮流相结合，乡村自然教育、智慧启迪教育、传统文化活化教育、乡村耕读教育、乡村书院、乡村博物馆等多元化乡村教育正在出现，这种教育有可能成为乡村迈向生态文明时代新乡村的启蒙运行。

其三，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的作用下，乡村自然资本、乡村绿色财富、乡村文化资本价值的发现，使乡村绿色发展成为乡村生态主义的新内涵。

其四，乡村特有的绿色、低碳、互助等生活方式，对城市中产阶层产生了新的吸引力，从而使新下乡运动成为潮流，这将会成为推动中国乡村生态主义潮流发展和乡村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值得我们关注与期待。